

1917-1950年蘇聯中國學研究的轉向

The Changing Direc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Soviet Union, 1917-1950

陳金鵬 (Chen Jinpeng) *

一、前言

20 世紀上半期蘇聯中國學的研究情況鮮見於各種文獻資料。西方學者認為蘇聯政府採取了有計畫的隔絕政策，為思想文化交流製造了一個充滿敵意的氣氛：政府控制著學者的交流活動，有條件地允許外國人探究蘇聯對中國的研究動態，蘇聯學者只能參與少數的國際學術會議，因此蘇聯中國學對外保持了神秘狀態。¹ 即使在俄羅斯和中國學者的漢學史著作中，關於這一時期的紀錄也出現了空白和斷裂，或語焉不詳，把敘述重點放在 60 年代之後的情況。²

正如社會制度的巨大轉型一樣，20 世紀上半期蘇聯的中國學研究經歷了意識形態和學術範式的雙重轉向，研究目標和服務對象與昔日的沙俄漢學相比有了極大的不同，忽視或無視這種變化就不能理解蘇聯後期中國學的發展趨勢和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本文從蘇聯學者如何繼承沙俄時期的學術遺產，以馬列主義思想指導中國學研究和傳統漢學在現代語境下逐步走向式微三個方面分析蘇聯中國學在這一時期的變遷，揭示在社會形勢作

用下研究方向發生轉移的必然性，進而說明蘇聯中國學與國際中國學的發展漸行漸遠的原因。

二、蘇聯學者傳承沙俄時期的中國學遺產

俄國漢學發源於 18 世紀中期。為了向在華俄國教民傳播福音，同時向俄國政府傳遞感興趣的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資訊，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Russkaia pravoslavnaia missiia v Pekine）的成員們承擔了學習滿語和漢語、收集中國文獻和編寫相關資料的任務。³ 雖然傳教士們並沒有很好地完成傳教的本職工作，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為俄國漢學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礎。漢學在俄國高等研究機構正式紮根的標誌是喀山大學（Kazanskij Universitet）漢滿語教研室成立（1837 年）以及東方學研究力量整合（1856 年），漢學在官方機構「合法化」的結果是培養了大批掌握中國語言能力和樂於為漢學研究效力的後備力量，他們憑藉著教師的口傳身教和自身

* 作者為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後研究。

1 Gilbert Rozman, *Soviet Studies of Premodern China*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1984), pp. 1-2.

2 參見 [俄] 李福清著，田大畏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小說戲曲）》（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莫東寅，《漢學發達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李明濱，《中國與俄蘇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3 關於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參見肖玉秋，《俄國傳教團與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的努力成長為俄國第一代職業漢學家，「王希禮學派」（Васильевская школа）即是代表，⁴ 蘇聯中國學家、科學院院士阿列克謝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認為這一學派有百分之九十的內容是由王希禮創立的。⁵ 他撰著的首部中國文學史、漢字檢字法、東方佛學文獻研究等為俄國在歐洲漢學強國中獨樹一幟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培養的實踐型人才是俄國對華事務中的主幹力量，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學院（Vostochnyj Institut）、俄國外交部、駐華使館等多處涉華機構都與其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

從 19 世紀末期開始有學者注意到王希禮學派的不足之處，一直持續到蘇聯和俄羅斯時期，對沙俄時期漢學研究的評價一直存在著爭議。彼得羅夫（А. А. Петров）注意到王希禮著作中含有為帝國主義政策辯護的反動立場，他激烈地批判了「資產階級東方學家的著作沒有任何理論和現實意義」，但格奧爾吉耶夫斯基是一個例外，他認為《中國的生活原則》（*Principy zhizni kitaia*）從「學術角度」來說是有利的，雖然它有很多缺陷，但「它仍然是革命前研究中國意識形態最好的著作」。⁶ 這種激進的立場反映了蘇聯學者試圖釐清漢學遺產中政治與學術的分界，希望繼承優秀的學術傳統、摒棄象徵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阿列克謝耶夫從純粹的科學角度評價了這一學派，在他看來，王希禮學派的學術是成功的，「它在精神和語言上是一個真正的俄國學派，不想重複別人的道路，

將思想的獨立性置於首位……這個學派的思想原創性很強……正確之處在於對中國的客觀研究；嚴格禁止個人偏愛普通和過於誇張的地方；他們將中國作為一種資料物件，用自己的方式加以理解」。⁷ 但是阿列克謝耶夫對王希禮學派的研究路徑提出了異見，「它的理論方法和主張（途徑和手段）非常顯著，有時甚至把樹枝折得吱吱作響，最終斷裂，然而距離科學卻很遠。這個學派的擁護者崇拜王希禮的著作，他的作品都是原創的、辯論性質的，與中國的因循守舊鬥爭，他極為仇視這些過時的東西」，⁸ 受到質疑的還有王希禮的教學方法，阿列克謝耶夫認為東方系的教學計畫隨意性太強，沒有明確的目標，教材陳舊一如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時期的著作，選用了艱深的文言文材料教授語言，中俄字詞對照的呆板方法無法調動學習的積極性，不利於學生掌握翻譯技能、適應現實的語言環境，結果是「學生都變成了書呆子，或者經受不了考驗而離開」，「王希禮付出了諸多努力，卻沒有結果」。⁹

應該承認的是，由於不具備現代科學對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學等科目領域的分類，造成了學生掌握漢語非常困難的局面，在專業研究方面沒有形成漢學特有的方法論，許多漢學家俱備了閱讀漢語、滿語、藏語等中國文獻的能力，但他們所從事的依然是 18 世紀傳教士的工作——材料的翻譯、彙編和整理，重歷史而輕現實，缺少理論高度、無法專注於某一具體問題研究以及漢學家對中國現實的集體性冷漠態度成為阻礙俄國漢

4 「王希禮學派」是指 19 世紀中期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Sankt-peterburgskij universitet）教授王希禮（В. П. Васильев）及其培養的漢學人才，成員包括伊萬諾夫斯基（А. О. Ивановский）、格奧爾吉耶夫斯基（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柏百福（П. С. Попов）、莫納斯特列夫（Н. И. Монастырев）、德米特里耶夫斯基（П. А. Дмитриевский）、波茲德涅耶夫（А. М. Позднеев）、科斯蒂列夫（В. Я. Костылев）、斯梅卡洛夫（Г. Ф. Смыкалов）、魯達科夫（А. В. Рудаков）、屈納（Н. В. Кюннер）等漢學家，他們接受過王希禮宣導的多語種、多學科訓練，以中國語言、歷史、文化為研究物件，注重原典研究，參見閻國棟，《俄國漢學史：迄於 1917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340。

5 李明濱，〈俄編首部文化典籍史——瓦西里耶夫院士著《中國文學史綱要》〉，收入《漢學研究》（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9），第 3 集。

6 А. А. Петров, «Философия Китая в русском буржуазном Китаеведении»（俄國資產階級中國學中的中國哲學），*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остока*（《東方書目》），вып. 7（М.: 1934）。

7 В. М. Алексеев,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東方之科學：文集與檔案》）（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82），С. 165。

8 同上註。

9 同上註。

學研究進步的瓶頸。

對沙俄時代的漢學學術史進行整理是一項迫切的任務。蘇聯東方學院士巴爾陶德 (В. В. Бартольд) 在《歐洲與俄國的東方研究史》中研究了從希羅多德時期到 19 世紀末歐洲人對東方不同地區的歷史文化觀念的形成和變遷，雖然篇幅不長，但涉及了俄國最早出使中國的巴伊科夫 (Ф. И. Байков) 和斯帕法里 (Н. Г. Спафарий) 使團、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俄國向北京派駐傳教士團、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漢滿語專業的設立等俄國漢學史上的重要內容，還介紹了俄國旅行家、傳教士、官員和學者對滿、蒙、藏等中國邊疆地區探險、勘測和考察的成就。¹⁰ 自俄國使團第一次出訪中國起，俄國學者極為注重收集中國的文獻資料，據中國學者閻國棟先生介紹，俄國漢學家遺留手稿數量龐大，加之年代久遠，部分字跡難辨，校勘工作異常艱巨，現已整理出版的作品只是九牛一毛。¹¹ 從 1928 年開始，斯卡奇科夫 (П. Е. Скачков) 致力於編纂一部涵蓋所有涉及俄國研究中國問題的書目。第一版的《中國書目》包含了 1730-1930 年間出版的漢學著作和未出版的手稿檔，在 1960 年問世的第二版《中國書目》中，覆蓋的著作時間段延長到了 1957 年。¹²

十月革命以前俄國的東方學中心是聖彼得堡，革命後首都莫斯科的教學和科研機構已經不能滿足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東方學家巴甫洛維奇 (М. П. Павлович) 指出：「科學院、亞洲博物館、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和俄國考古協會東方分會……在理論領域中無所作爲，也不會有什麼貢獻，新東方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只能用理論加以解釋。舊東方的一切歷史、經濟、政治和精神生活，以及它幾千年不變的形態——這些只能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加以解釋」。¹³

1918 年 9 月 7 日，人民委員會接到列寧的指令，開始籌備組建新的東方學院，東方活語言中央學院 (Central'nyj institut zhivyh vostochnyh iazykov) 由原來莫斯科的拉札列夫斯基學院 (Lazarevskij institut) 改建而成，列寧格勒東方活語言學院成爲莫斯科學院的分院。這兩所學院的教學計畫從狹窄的語言教學發展到培養全面的實踐工作者、瞭解東方國家以及國家的歷史。莫斯科的中央學院在 1921 年與其他東方學機構合併，改組爲莫斯科納里馬諾夫東方學院 (Moskovskij institut im. N. Narimanova)，列寧格勒的東方學院 1927 年更名為葉努基澤東方學院 (Vostochnyj institut im. A. Enukidze)。爲了聯合蘇聯國內的東方學研究力量，1921 年 12 月 13 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於通過成立東方學協會的法令。起初東方學協會 (Nauchnaia associaciia vostokovedenii) 接受人民委員會民族事務部的管轄，後轉由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 (ЦИК СССР) 負責。東方學協會政治經濟部門主任古爾科·克里亞任 (В. А. Гурко-Кряжин) 指出：「蘇聯政治、外交和經濟在東方國家中面臨非同尋常的任務，自然要求深入、細緻地研究東方生活的每一個領域。舊的東方學機構無法實現這些目標，因此有必要建立新的革命東方學實驗室」。¹⁴

1930 年，在亞洲博物館和東方學家聯合會 (Kollegiia vostokovedov) (包括突厥學研究室和短暫存在的佛教文化研究所) 的基礎上，於列寧格勒成立了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 (Institut vostokovedenii AN SSSR)。它由兩個機構組成：歷史經濟研究所和文學研究所，還有 9 個研究室，其中有中國唐古特歷史研究室。除了依附於東方學體系的中國學研究機構之外，在莫斯科中國勞動人民大學 (Kommunisticheskij universitet trudiaschihsia Kitaia)¹⁵ 裏還成立了專門的中國問題研究機構——中國

10 В. В. Бартольд,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歐洲與俄國的東方研究史》)(Курс лекций, 2-е изд. Ленинград, 1925).

11 閻國棟,《俄國漢學史：迄於 1917 年》，頁 674。

12 參見 П. Е. Скачков,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中國書目》)(Москва: Изд. вост. лит., 1960)。

13 В. Н. Никифоров,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 (《蘇聯歷史學家論中國問題》)(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о, 1970), С. 85.

14 同上, С. 82.

15 莫斯科中國勞動人民大學成立於 1925 年，又名「中山大學」，致力於爲中國培養革命人才，參見 [美] 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研究所 (Nauchno-issledovatel'skij institut)，定期出版刊物《中國問題資料》(Materialy po kitajskomu voprosu) (後更名為《中國問題》(Problemy Kitaia))。

東方學新機構的誕生很大程度上是蘇聯領導者意志的體現，他們希望擺脫沙俄時期漢學的研究趣味——中國儒道典籍、詩詞小說、神話傳說等充斥著「異國情調」的東西，將目光轉向聯合受壓迫的東方民族，瞭解東方人民的社會變化和現實需要，特別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偉大思想武器研究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發展，探索中國與世界革命的同步關係。

三、以馬列主義思想指導中國學研究

20 世紀上半期的中國社會舞臺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辛亥革命爆發，中國共產黨誕生，國民革命戰爭，軍閥混戰，西方勢力進一步入侵中國政治、外交、軍事、經濟領域並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傳統意義上封閉停滯的「天朝帝國」已經不復存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思想啓蒙的蘇聯知識份子自然不能無視東方的巨變，他們急切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中國變化的社會原因，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原理看待人類社會發展，並據以區分歷史文明的不同階段，分析每一階段中的社會矛盾和進步動力。

馬克思生前並未專門研究過中國問題，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的概念，「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¹⁶ 這一概念被用來指涉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形態中最原始、最初級的階段。馬克思對俄國和印度的農村公社進行深入研究並與日爾曼的農村公社加以對比後發現「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地域上超出了亞洲的範圍、在時間上超出了原始社會的邊界，是世界各個民族的歷史發展中普遍存在的階段。但是馬克思並未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給出過準確的定義，為後

來的學者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主要特徵的適用範圍的爭論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第一次將「亞細亞生產方式」與中國問題聯繫是梁贊諾夫 (Д. Б. Рязанов) 為馬克思的文章〈中國與歐洲的革命〉譯文撰寫的前言，發表於 1925 年 6 月 14 日的《真理報》(Pravda) 上，作者贊同中國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達林 (С. А. Далин) 也堅持認為中國存在一種亞細亞社會的形態。但是他們的觀點遭到普里科任 (А. Г. Пригожин) 和休卡爾 (М. И. Щукар) 的反對，後者認為中國前資本主義社會是封建生產關係。1927 年 5 月 1 日的《真理報》刊登了美國駐共產國際主席約翰·派普 (John Pepper) 的文章，他反對拉德克 (К. Б. Радек) 認為中國當代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也不承認中國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他認為中國不存在封建主義階級形式而是「存在著發達的資本主義」。從這篇文章開始，人們開始廣泛討論「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否存在於中國的問題。

瓦爾加 (Е. С. Вапра) 在馬克思·韋伯 (Max Weber) 和普列漢諾夫 (Г. В. Плеханов) 的影響下接受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他認為中國的統治階級是一個學者精英階層，農村中的「家族統治」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政權是適應管理大型公共工程的產物，「亞細亞生產方式」由此產生。馬季亞爾 (Л. И. Мадьяр) 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指的是 20 世紀以前的中國社會和經濟制度，當時中國還沒有私有制，「亞細亞生產方式」中的亞洲因素並不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種普遍的、資本主義社會之前人類必經的歷史階段。科金 (М. Д. Кокин) 和巴巴揚 (А. К. Папаян) 認為周朝時期的「井田制」是中國古代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主要證據，沒有土地的農民既要在租賃的耕地上種田，又要在國家的土地上勞作，這是一種租賃與稅賦聯繫的新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反對者杜勃羅夫斯基 (С. М. Дубровский) 在《亞細亞生產方式、封建制、農奴制和商業資本主義的本質問題》中提出世界歷史中的 10 種生產方式，沒有一種屬於「亞

1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 33。

細亞生產方式」，在他和其他反對者看來，「亞細亞生產方式」只不過是封建制或奴隸制生產方式的一個變種，並不是獨立的。

從 1930 年到 1931 年，在第比利斯、巴庫和列寧格勒先後召開了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會。在前兩次會議上，贊同中國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聲音佔據了主流，科金、巴巴揚等與反對者展開了激烈的爭辯。「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認為決定官僚統治階層地位的不是其經濟狀況，而是這一階層的功能和作用，約爾克（Е. С. Иolk）和戈傑斯（М. С. Годес）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可能對共產國際發動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努力產生威脅，戈傑斯還注意到「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支持者無法在階級鬥爭和東方社會的框架中解釋從亞細亞社會向下一個歷史階段的轉變。反對者認定「亞細亞生產方式」只不過是奴隸制社會和封建主義社會在亞洲的另一種形式。¹⁷ 關於中國是否屬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爭論其實是蘇聯共產黨在指導中國革命路線內部分歧的體現，如果中國被定義為封建主義或半封建主義社會，那麼中國革命的性質將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就成為必然趨勢，如果中國符合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所有特徵，那麼孱弱的中國資產階級無法擔當領導中國革命的任務，領導者將在農民和無產階級中產生，目標是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研究中國問題的熱忱具有強烈的政治訴求，共產國際的成立為中國問題學者提供了廣闊的政治參與空間。1926 年，共產國際提出中國革命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支持的民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为主要推動力量；在第二階段，工人階級是主要的政治因素，無產階級與農民形成了聯盟，農民積極與小資產階級和部分商業資產階級聯合爭取自己的利益；第三階段，革命運動的基本力量是更具有革命特徵的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完全排除了大資產階級的參與。

1927 年 3 月 13 日，拉德克在公開發表的講話中認

為共產國際在 1924-1926 年在中國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和發動反封建農民革命的路線是錯誤的。在俄共（布）第 15 次代表大會上，洛米納澤（В. В. Ломинадзе）和米夫（П. А. Миф）對共產國際的報告產生了爭論。洛米納澤高估了 1927 年中國革命的規模，誇大了中國剝削階級的危機和衰落，他認為作為獨立個體的中國資產階級已經不存在了，剩下的資產階級團體在民族統一陣線失敗後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控制，這些情況造成無產階級可能奪取權力，革命很快會推進到社會主義軌道。米夫提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仍然是獨立的階級力量，是無產階級與霸權鬥爭的夥伴，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僅存在，而且中國將走向獨特的「斯托雷平式」的道路，鬥爭的首要目標不是地主，而是富農。雅各松（Г. М. Якобсон）在《革命的東方》（*Revoluzionnyj vostok*）上駁斥了洛米納澤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消失」的觀點，他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在麵粉工業和紡織工業佔據了優勢地位，中國的階級力量情況極為複雜。

這一時期研究中國歷史的著作不僅批判「中國停滯論」的傳統價值取向，亦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形態與社會制度的關係角度分析中國歷史的長時段發展進程。哈爾恩斯基（К. А. Харнский）在 1927 年出版的《中國歷史》（*Kitaj s drevnejshih vremen do nashih dnei*）中認為歐洲人與生俱來的種族優越感妨礙了他們客觀地看待中國民族的進步，實際上中國與歐洲國家的歷史發展有很多共同之處，二者之間的交流管道從未封閉。哈爾恩斯基引用大量的史料證明中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相互影響，他批評了一種荒謬的觀點，即「中國人保持了某種不確定的、似乎是獨有的封閉性，將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哈爾恩斯基認為「根據書本研究中國的人如果知道城牆不是為了將自己「隔絕於世界」，而是為了保持和世界的聯繫而修建了這個著名建築的很大一部分，也許會非常震驚。城牆的其他部分有大門，從過去到現在，內部居民通過大門保持著對外貿易聯繫」。¹⁸

中國與西方歷史發展規律的共同性也是哈爾恩斯基

17 Joshua A. Fogel, "The Debates over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Soviet Russia, China and Jap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No.1(Feb., 1988): 56-79; O. Edmund Clubb, "Soviet Studies and the Asian Revolu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31, No. 4(Dec., 1958): 380-389.

18 В. Н. Никифоров,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 (《蘇聯歷史學家論中國問題》), С. 118.

基關注的問題，他通過對比發現歷史傳說人物堯、舜的統治在年代上與埃及古代王國的衰落相吻合，商殷時期與埃及新王國、赫梯人、愛琴文化、古巴比倫的終結時間吻合，當西元 3 世紀至 5 世紀中國歷史發生斷裂的時候，地中海世界也出現了嚴重的危機。他將秦朝和漢朝視為中國「第一帝國」時期，隋朝、唐朝和宋朝時期（從 6 世紀到蒙古人統治）屬於「第二帝國」時期。在哈爾恩斯基看來，當中國進入「第一帝國」時期後，幾乎與希臘羅馬世界同步，在中世紀早期中國處於領先地位，唐朝時「在「精神文化」方面處於當時歐洲無法企及的高度」。¹⁹ 哈爾恩斯基認為中國從 15 世紀起開始落後於「西方」的原因是不同國家發展水準的不均衡，在中國表現為農業危機，他以日本為例證明在現代的耕作方式（肥料，人工林，灌溉）下，糧食產量可以大大提高，而中國清朝即使在人口較少的時候也有饑荒現象，因而哈爾恩斯基認為中國貧困的根源不在於人口增長。哈爾恩斯基的困惑來自於不能清晰地解釋中國歷史不同階段的社會形態，事實上即使研究最徹底的歐洲國家，它們的古代和中世紀屬於什麼制度，當時的蘇聯歷史學家也沒有統一的想法，哈爾恩斯基認為「封建制度關係」屬於政治分裂時期，而在中央集權時期、商業資本處於「統治地位」的時候，中國商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完整的，顯然與歐洲的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概念形成了悖論。

與傳統漢學家熟稔中國語言、以文本分析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不同，研究中國政治歷史問題的蘇聯理論學家始終強調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為學術研究的不二法則，並以之為分析人類各種社會現象的普遍工具。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有意識地放棄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主義人文傳統，並與西方最新的社會學理論保持相當的距離，甚至給予強烈的批判。他們在一個封閉、狹小的圈子裏牽強附會地把馬列主義理論與想像中的中國社會相拼接，以至於造成中國知識的嚴重失真，使得這類著述的學術價值不高。他們希望用嶄新的理論武器使古老的漢學脫胎換骨，但是對歷史經驗和多樣化學理的抗拒造成了論著千篇一律的「學術奇觀」。

四、傳統漢學逐步走向式微

20 世紀初期階段，蘇聯的國內外形勢舉步維艱，中國學家面臨著多重焦慮：帝國主義對蘇聯的聯合干涉造成了國家經濟狀況不良，政府施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新經濟政策側重於國家軍事和工業發展，教學科研經費得不到保障，蘇聯學者與國際同僚的學術交流被迫中斷，甚至面臨著生計上的困難，造成了多名學者喪身於饑荒和戰亂的慘劇；比物質上的艱難條件更嚴酷的恐懼來自政治清洗，由於學者多繼承沙俄體制下的研究路徑和話語模式，遭到蘇聯當局政府的嚴厲審查，官方以極其嚴格的規訓方式管轄學術研究，蘇聯學者不得不被動適應新的意識形態要求，致力於建立符合馬列主義思想的學術體系。對沙俄與蘇聯的研究氛圍之迥然相異，身處列寧格勒的「舊學派」中國學家感受尤為深刻。

十月革命之後，列寧格勒的中國學家依然保持著小範圍內的活動。1919 年 8 月至 9 月，列寧格勒的東方學家舉辦了第一屆佛教展覽，展品主要來自中國的敦煌和黑水城。展覽上東方學家做了宗教歷史的講座，隱晦地表現試圖理解和接受蘇聯現實的希望。謝爾巴茨科伊（Ф. И. Щербатской）提出佛教中沒有上帝、靈魂不滅和意志自由，這些方面「將被我們的哲學預言所理解和轉述，它們恰好與實踐的科學世界觀領域的最新成就具有良好的親緣性——否認私有制權利，否認民族的限制，實現人類共同團結」。鄂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院士也表達了類似的思想：「現代人具有很多不足之處，他們嚮往民族團結，需要瞭解人類已經取得的成就，因此研究和理解佛教世界對我們很有意義」。²⁰ 謝爾巴茨科伊認為印度最初的佛教是單純的，後來在西藏和蒙古產生變形，難以辨別。而弗拉基米爾佐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認為佛教一直未變，被不同的繼承者接受，有些方面發展了，而有些方面落到了後面。

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去世後，《俄國科學院通訊》立刻刊發訃告，巴爾陶德認為沙畹站在全新的立場上，過去人們只承認古希臘、

19 В. Н. Никифоров,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 (《蘇聯歷史學家論中國問題》), С. 119.

20 同上, С. 70.

猶太和羅馬的歷史，而他尋找西方文化和獨立的遠東文化之間之共同之處。鄂登堡認為，沙畹是漢學新學派的領軍人物之一，他最大的貢獻是對中國人獨特思維的理解。巴爾陶德和鄂登堡稱讚沙畹摒棄了舊漢學時代博而不精的方式，走向專業化的集中研究。

作為「王希禮學派」在十月革命後僅存的成果之一，阿列克謝耶夫延續了「舊學派」的某些特點，但是又與王西里的極端懷疑主義做法劃清界線。在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畢業後，阿列克謝耶夫先後赴英國、法國和中國參加學術研討和交流，還曾與沙畹完成了四個月的中國北方實地考察，完成了《中國紀行》（*Vstarom Kitae: Dnevnik putestviiia 1907 g.*），為學術界提供了大量珍貴的中國民間文化資料——年畫、剪紙、神話傳說和珍本典籍。像百科全書式的漢學家王西里一樣，阿列克謝耶夫善於在歷史、文學、哲學的人文科學體系中穿梭跨越，而且他研究的題目頗有深度和廣度，他的博士學位論文「論詩人的長詩——司空圖的詩品」（*Kitajskaja poema o poete. Stansy Cykun Tu(837-908)*）為蘇聯時期以及當今俄羅斯的中國文學翻譯和研究提供了範例。²¹ 他堅決反對懷疑主義和偏向性的研究方式，這一點是受到鄂登堡的影響，鄂登堡認為學者無論在面臨東方還是西方的時候都不能保持高傲的態度，應尊重每個民族的歷史傳統，避免狂熱、偏執、激進的不理性態度。²² 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思想後的阿列克謝耶夫開始用批判現實主義的角度重新審視中國文學和歷史作品，他指出了中國封建主義時期儒學意識形態對學術的「踐踏」，對其他學者脫離社會現實研究文本的做法提出批判，在十月革命 30 周年的時候，阿列克謝耶夫寫道「新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使人們對中國發生的一切有了全新的理解……蘇聯的中國學家開始用全新的方式研究中國，按

照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要求，摒棄十月革命以前危害我們學術的殖民主義異國情調」。²³

在培養學生的時候，阿列克謝耶夫依然只傳授給他們語言和文本的純學術知識，「忽略」馬克思主義方法。以楚紫氣（Ю. К. Щуцкий）為例，這位阿列克謝耶夫的得意門生對中文、日文有著極高的領悟能力，主要興趣集中在道教，對《易經》的研究頗有見地，他從當代《易經》文本的完整性、文本內部的語言和思維差異、與古漢語方言的關係、各部分寫作的年代順序、文本與社會制度的關係、詮釋歷史、《易經》對儒釋道思想的影響、翻譯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構想。楚紫氣 1928 年被蘇聯科學院派往日本公幹，1936 年成為國立艾爾米塔日博物館（*Gosudarstvennyj Ermitazh*）研究員，1937 年 8 月回國後慘遭厄運，以「間諜罪」的名義被當局宣判極刑。直到 1960 年，凝聚楚紫氣一生研究成果的《中國經典《易經》》在作者得以平反後才問世，²⁴ 並多次再版，成為俄羅斯東方學的經典之作。

對於「舊學派」的學術活動，莫斯科的理論學家從未放棄不遺餘力的抨擊。新一代的中國學家卡拉·莫爾紫（Г. С. Кара-Мурза）指出，「資產階級漢學是一種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意識形態武器。帝國主義為科學及其從業者提供支援——漢學家的狹小圈子裏主要是傳教士、領事以及外資商業代理人。」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漢學對歷史、對帶有異國情調的古代中國文化的闡釋是現實中掩蓋掠奪和毀壞當代中國的一副面具。²⁵ 卡拉漢（Л. М. Карахан）在《新東方》（*Novyj vostok*）上寫道：「我們在東方執行的政策，是要讓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走向新生活 and 反抗。我們應當瞭解這些民族，瞭解他們的經濟、政治生活和社會政治結構。遺憾的是，我們的東方學家能做的很少，特別是中國學家，除了少數例外

21 李明濱，〈阿翰林的學術成就——紀念蘇聯漢學的奠基人阿列克謝耶夫院士誕辰 110 周年〉，載《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1:6（1991.12）：120-123。

22 Helmut Martin, "Soviet Scholarship o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 6, No.1/2(Jul., 1984): 151-178.

23 В. Н. Никифоров,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蘇聯歷史學家論中國問題》），С. 332.

24 Ю. К. Щуцкий,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Перемен"*（《中國經典《易經》》）（Москва: Изд. вост. лит., 1960, 1992, 1993, 2003）.

25 Joseph Barnes, "Soviet sinology," *Pacific affairs*, Vol. 7, No.3(Sep., 1934): 331-333.

情況，他們認為不值得去碰那些沒有歷史灰塵的東西。他們可以認真對待中國的考古和上千年的手稿，但是在中國學家嚴重不足的條件下，我們不能允許自己一味陷入在僵死的歷史中，我們還不瞭解鮮活的、苦難中的民族，我們和他們有數千俄里的共同邊境，我們不能放棄對他們命運的重要影響」。²⁶ 出於為現實東方學服務的需要，《新東方》刊發了大量關注東方革命運動和政治、經濟、民族現狀的文章，並極力與革命前資產階級學派劃清界限，如古爾科·克里亞任指出了阿理克研究現代中國文章的不足——對社會現象缺乏認真的關注，陷入了細節考察；當屈納的著作《中國現代政治史綱要》（*Ocherki novejshej politicheskoi istorii Kitaia*）問世後，《新東方》編輯部撰文批判了作者認為中國不存在封建主義殘餘的觀點，並歸結於作者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語言學研究是極少數未受到新意識形態衝擊的領域之一。蘇聯語言學家、中國學家龍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駁斥西方漢學家馬伯樂（Henri Maspero）、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認為漢語缺乏變化、沒有語法的觀點，他以甘肅、陝西等北方方言的發音、詞類和句式結構系統化地證明瞭漢語形態的多樣性，他認為「詞類·語法範疇在漢語語法系統裏占中心地位……離開這些範疇，就不可能理解漢語的構造上的特點，也就不可能說明漢語的語法」。²⁷ 1928年，他在歐洲漢學刊物《通報》上發表了《古漢語的重建》，試圖在高本漢和馬伯樂的研究基礎上重建中國古漢語的發音體系。²⁸ 龍果夫還對東干民族語言的語法進行研究，著有《東干語語法研究·第一卷 東干語語法研究東干語的體和時態範疇（甘肅方言）》（*Issledovaniia v oblasti dunganskoi grammatiki, ch.1 — Kategorii vida i vremeni v dunganskom iazyke(dialekt Ganjsu)*），被稱為「東干語語言學科的奠基人」。

從蘇聯中國學出版物的結構比例來看，對中國文、史、哲領域的研究成果已經不再佔據主要位置。據統計資料顯示，在1937年到1947年蘇聯出版的關於中國問題的論著（文）、譯著（文）中，研究中國農民戰爭、革命起義、中蘇關係等政治歷史問題的共有18部（篇），研究中國現代語言學、革命文學問題的共有23部（篇），研究蘇聯和西方漢學史的共有3部（篇），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哲學、藝術題材的共有23部（篇），共計67部（篇）。²⁹

與蘇聯國內的艱苦環境和緊張氣氛不同的是，身在中國的蘇聯以及僑民學者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列寧格勒東方活語言學院教授伊鳳閣（А. И. Иванов）1923年開始在北京大學任教，與王國維、陳垣、鋼和泰、陳寅恪、柯劭忞等受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開設「西夏文字與西夏國文化」研究班，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1923年第1卷第4號上發表了〈西夏國書略說〉，對西夏文字的創立歷史、書寫、讀音、字意以及同時代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引徵、評介。³⁰ 另一位被聘為北大國學門導師的俄國流亡貴族漢學家鋼和泰（Александр фон Сталь-Гольштейн）主講梵文和印度古宗教史課程同時擔任口譯，舉辦了「佛陀傳說中的歷史的部分」、「玄奘與近代之史學研究」和「故宮咸若館寶相樓佛像之考證」等講座，著有《音釋梵書與中國古音》、〈一份在乾隆年間譯成梵文，在道光年間譯成漢文的藏文文獻〉、〈論對十世紀漢字音譯梵贊的重新構擬〉等論文和著作，在佛學以及漢語音韻學領域得到了中國同行的認可，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並獲得了法國榮譽軍團十字勳章。³¹ 除北京之外，哈爾濱也是蘇聯流亡海外漢學家的聚集地之一，如研究中國經濟、法律並編寫辭典的希奧寧（А. П. Хионин），翻譯中國民間文學的巴拉

26 В. Н. Никифоров,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проблемах Китая* (《蘇聯歷史學家論中國問題》), С. 82.

27 [蘇] А. А. 龍果夫著，鄭祖慶譯，《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第一卷 詞類》（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頁3。

28 A. Dragunov, "Contribu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Y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26, No. 1 (1928): 1-16.。

29 Rudolf Loewenthal, "Works on the Far East and Central Asia Published in the U.S.S.R., 1937-1947,"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8, No.2(Feb., 1949): 172-183.。

30 閻國棟，《俄國漢學史：迄於1917年》，頁482。

31 同上註，頁485-487。

諾夫（И. Г. Баранов）以及研究中國宗教、民俗和神話的什庫爾金（П. В. Шкуркин），在不被祖國接納的困境中，他們不得不在異國艱難地繼續自己的中國學事業。

五、結語

在蘇聯和俄羅斯的中國學史上，1917-1950 年是一個轉折性的重要年代，也是一個乏善可陳的時代。革命、戰爭、馬列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政權的建立衝擊著古老的漢學，中國學家不再囿於書齋研究歷史化石般的「中華帝國」，新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席捲了學術界的一切領域，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摧毀了舊時代的學術體制和傳統觀念。但必須指出的是，蘇聯政權在建立「新學」的同時沒有很好地繼承「舊學」的有益遺產，有學者認為，

蘇聯時期的政治運動對中國學研究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特別是從 30 年代以來蘇聯學者的學術著作多以教條僵化的馬列主義為嚮導，放棄了本應遵循的科學規律，其價值微乎其微，更為嚴重的後果是造成日後蘇聯和俄羅斯中國學徹底失去了歷史的輝煌，淪落為次要角色。³²

蘇聯初期的中國學研究不僅與沙俄時期產生了話語表述上的斷裂，更與同時期正處於中國學研究範式轉換階段的國家被人為地拉開了差距。20 年代初，正當美國政府和財團以巨額資金扶植新興的中國學學科在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紮根時，蘇聯知識份子正在以消極的方式回應新經濟政策對意識形態領域的統帥和整合，革命前逃亡海外的僑民學者心態由觀望轉為失望，喪失了大量菁英知識份子的蘇聯直到 20 世紀 50 年代才培養出符合自己標準的中國學人才，但冷戰造成的鴻溝業已形成，蘇聯中國學失去了與國際學術界對話的機會。

32 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72-73。

即將登場

「發現經典——閱讀古人生活美學」導讀講座

為配合漢學研究中心成立三十周年，並倡導國人閱讀歷代優秀之經典古籍，國家圖書館特自今年 9 月起舉辦「發現經典——閱讀古人生活美學」系列推廣閱讀活動，為期三個月。挑選《世說新語》、《茶經》、《唐人小說》、《東京夢華錄》、《三言》、《鏡花緣》、《閒情偶寄》、《幽夢影》、《老殘遊記》、《稗海紀遊》等 10 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邀請名家、學者舉行「經典導讀講座」，並安排圖書展覽等，藉以啟發眾人心智，提升閱讀能力。

地點：國家圖書館

時間：2011 年 9 月 8 日起至 12 月 7 日止

導讀講座於星期六，下午 2：00 - 4：00 舉行